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青龙书系

大学治理



蔡先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学治理

蔡先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治理 / 蔡先金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09-09597-6

I. ①大… II. ①蔡… III. ①高等学校—学校管理—
研究—中国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926 号

大学治理

蔡先金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6.7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9597-6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韩延明

说来也真凑巧，当济南大学蔡先金教授将其撰著的《大学治理》一书的文稿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时，我正在中共山东省党校参加“省管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第五期专题培训班”，恰好有一个专家辅导报告便是《社会治理》。细读书稿，回味报告，相互映照，静心思考，顿觉豁然开窍，对“大学”“治理”“大学治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和更加深透的领悟。

(一)

《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大”，在于大学是育人之本、科学之根、文化之魂；在于大学源远流长，万寿无疆，与人类共存亡。在英语中，大学（university）和宇宙（universe）、普遍性（universality）源于同一词根 univers，意指高远、普遍、广阔、宽泛、包容、全面，博大精深，绵延不断。就此而言，大学的含义本身，也就是尽可能地广泛，尽可能地普遍，尽可能地延展，尽可能地网罗众家、囊括大典。

我们常说，大学是探究学术的殿堂，大学是知识起航的海港，大学是青春绽放的广场，大学是美梦飞翔的天堂。大学是一道洒满阳光的风景，大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空。大学里洋溢着智慧和学问，大学里充满着难题和争论。大学是社会道德的榜样，大学是人类文化的向往。大学是一种精神能量，大学是一种价值弘扬。

鲁迅先生说过：“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回首西方大学发展的漫漫历程，从“经院哲学”到“永恒不变的理性”，再到服务社会的“威斯康星”；从一个“僧侣居住的村庄”到一处“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再到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虽几番陵谷、春秋数易，然大学始终怀抱一颗虔敬而敏锐的心灵，孜孜不倦地追寻着

人类最美好的梦境。大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保存、传递、创造和应用着科学文化知识，使人类因此而不断奔向智慧与光明的胜景。大学崇真、向善、求美、务精，修炼心智，涵养性灵，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和动力站，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生长点，是科技产业的孵化器和高新技术的辐射源。概言之，大学是以传授高等知识、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开发高新科技为核心内容的高投入教育机构。

有则短信说得好：“不一样的回味，不一样的心醉；只记得那时的淳美，那时的光辉。”大学一如既往的气度恢宏、胸怀宽广，名师荟萃、桃李竞芳，洋溢着一种大象无形的圣洁、神韵和灵光，“状似明月泛云河，体如轻风动流波”，其宁静、性灵、风骨、志趣、情采、悟性融会贯通。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事物的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任何一种大学教育，如不借助于文化来传道，必将缩短它的历史长度，必定会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黯然失色或悄然失落。理性捍卫大学，捍卫大学理性，这是学人的神圣使命。马克思有言：“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大学乃知识传播、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和科技发达的综合标志，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创新力及其思想的容量、文化的追求、智慧的水准和精神的高度。无大学，则无高等教育大国，更无高等教育强国！大学之强就是民族之强，大学之伤就是国家之伤。中国大学怎么样，中国未来就什么样！

（二）

谈到“治理”一词，而今大家都不陌生。它既是一个动词，如整治、疏浚、管控、驾驭、“治国理政”等，又是一个名词，如吏治、礼治、法治、德治、“天下大治”等。治理，英文为 Governance，原本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意指“控制、督办、引导、运作和操纵”，后延伸到企业、治安、水利、教育、环境等领域，如企业治理、综合治理、河道治理、教育治理、环境治理等。

何谓“大学治理”？我赞同蔡教授在书中所阐明的基本观点：大学治理就是准确认知和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与社会、与家长的外部关系和大学内部关系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过程，包括确定大学教育理念、厘定大学发展目标、设定大学改革策略、制定大学运行举措等，以便有效解决大学治理体系所涉及的三个核心问题，即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如何，也就是大学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换言之，大学治理不仅要知道怎么看，还要知道怎么办和怎么干，因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有序、协调、动态、高效和

可持续的制度运行系统。特别是蔡教授提出的“善治”理论，更令我们耳目一新。他认为，善治是大学治理体系的理想目标，是大学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系统工程：就治理主体而言，善治即“善者治理”；就治理目的而言，善治即“善意治理”；就治理方式而言，善治即“善于治理”；就治理结果而言，善治即“善态治理”。

无须讳言，较之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大学治理理论与实践，我国的大学治理总体上才刚刚“起步”，集中表现为“欠成熟化”的阶段特性和“摸索前行”的变革态势，具体反映在大学治理理论不够成熟、治理目标不够明晰、治理体系不够健全、治理措施不够完善等方面。古人云：“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大学治理，亦复如此！

(三)

常言道，看书看皮，看报纸看题。细而阅之，蔡教授的书名虽为《大学治理》，但其十篇“正文”和六篇“附录”已远远超出了“大学治理”的范畴，而是蕴含了更为丰满、更为宽泛、更为深层、更为粹精的内容，可谓大气魄、广链接、著力作，思接古今，视通中外，功不唐捐，亮点纷呈。宏观论得意境高远，微观述得细致入微；内涵外延梳理明晰，来龙去脉发掘到位；科学考量得失，客观剖析兴衰。

通览之，该书除了具有作者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史料精粹、思想深邃、笔触犀利、观察敏锐、语句凝练、创新思维等几个主要特点外，还彰显了如下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点赞”与“点穴”相结合。点赞，即阐扬大学成就，可谓亮德治之光；点穴，即针砭大学时弊，可谓悬法治之剑。二是“追溯”与“追求”相结合。追溯，即回眸大学历史发展，可谓史海钩沉；追求，即前瞻大学未来走向，可谓筑梦创新。三是“担忧”与“担当”相结合。担忧，即忧思大学现实短板，可谓查缺补漏；担当，即承载大学改革重任，可谓勇毅履责。四是“进言”与“进行”相结合。进言，即坦诚谏言大学发展，可谓献计献策；进行，即率先试行革新方案，可谓敢作敢为。五是“讲座”与“讲话”相结合。讲座，即大学专题研究，可谓学术交流；讲话，即大学工作部署，可谓治校实践。六是“实然”与“应然”相结合。实然，即大学是什么，可谓本真反映；应然，即大学应当是什么，可谓价值期待。窃以为，高端的学术精品应该是抱诚守真、茹古涵今，不仅能看到汗水的流淌，还要看到智慧的光芒。该书不仅“正文”内蕴厚重、见解独到，而且“附录”也是探微索隐、哲理深刻。

在我珍藏本的书架上，至今仍端立着蔡先金教授于2008年12月6日当面亲

笔签赠的《大学经纬》一书。当时我还在大学工作，虽然初识，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气质”不凡、“颜值”颇高：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富含睿智，谈吐高雅。我调来济南工作后，特别是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成立以来，与他接触渐多，而每次都能在短暂交流中激发灵感、忽生顿悟，更深感他的学识通达、思路开阔、绅士风度、人师情怀。孔夫子讲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君子”特征，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他是一位灵心慧眼、才华横溢、文质彬彬的“创客”，是一位勤奋读书、勤勉工作、勤于写作的学者型领导。古诗云：“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这位吉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学博士后，在世人抱怨时间太碎、工作太累、意志太脆的今天，依然与书为伴、思绪不乱、笔耕未断。当下，有的人不仅撕碎了读书的时间，分散了读书的精力，失却了读书的兴味，甚至动摇了读书的信念，徒叹“自家慢调便便腹，开卷方知未读书”，更遑论铢积寸累、披坚执锐地去“著书立说”呢！

蔡教授虽然没有系统地攻读过高等教育学专业，但我认为，他却颇具“教育家修为”。由于专职于大学教育管理而专心于大学教育研究，他正如那句广告词所言：“因为专心，所以专业。”并由专业进入志业和创业状态。他梳理和拷问能力特强，辨析和发现能力颇棒，提炼和建构能力更靓。说古论今，侃侃而谈；话中叙外，娓娓道来。单就探寻大学发展史而言，我品悟，他不是在水面上飞翔，而是像鱼鹰的嘴，伸进更深的水层。既有对大学历史的追问，也有对大学现实的拷问，更有对大学未来的叩问，仿佛夜来的风雨和啼血的布谷，生发出春的气息。他气定神凝、沉潜探索，总能挖出一段段源起，列出一串串命题，找出一个个痼疾，提出一项项策弈。正如司马光在谈到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时所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天盘点考证，多少回扼腕反省，蔡教授是在用自己的治学秉性和学术生命为大学教育立言、立信、立功，每个词句和概念的背后，都浸润、渗透和砥砺着他的热血、激情、智慧和理性。他审形谋势，革故鼎新，疏浚着E时代大学教育的理路和水脉。读他的文章，真如《老残游记》里描写的：“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他没有被权力异化，没有为市场媚俗，没有因忙碌搁笔。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言：“思考教育，这是使命与责任使然，从来也无法停止，也不可能停止。……大年三十，我在写；大年初一，我在伏案；一直到大年初十，我在电脑前消耗着自身的内能。这样对自己、对他人有些不近人情，因为这是过年期间，家人需要的是团聚，朋友需要的是问候，大家需要的是交往。我却在斗室之内思考着教育，关注着大学教育综合改革。”对大学教育的这份痴

情、这份责任、这份敬畏和担当，由此可窥一斑。他沿着“大学之道”一路走来，从《大学经纬》到《大学崛起》，再到《大学治理》，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既“溯本探源”又“远瞩高瞻”。记得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有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叫《敢问路在何方》。我确信，再创辉煌的“大学研究”和“大学治理”之路，一定会在蔡校长脚下健步延伸，延伸……

(四)

序稿草完，恰逢元旦。古人云：“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今日还是泉城极为难得的天气晴朗、惠风和畅。经历了多日重度雾霾的侵袭和忧伤，倍感时下清风无霾的舒畅和对蓝天白云的渴望。璀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徐徐地照进书房，像一方亮闪闪的金丝锦缎，静静的，柔柔的，暖暖的，于是连人带心一起沐浴在那宁静的温馨里，神清气爽。书桌一角那盆气根发达、株形飘逸、被称为“生命之花”的绿萝，枝蔓娇艳，饱满光鲜，与研究生上午送给我的节日鲜花交相辉映，绿叶葱葱，馥郁芬芳，一派生机盎然，沁人心扉。我蓦然感觉：春天来了，大学治理的春天也来了！

2016，我深信人类的进步，深信祖国的富强，深信大学的力量，深信梦想的光芒。正如习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言：“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喜阅蔡君《大学治理》，先读为快，略抒感慨，是为序。

2016年1月1日草于千佛山麓明静轩

（序者为高等教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临沂大学校长，现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目 录

序	001
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源起与沉浮	001
比特时代：实体大学终结或存续	030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大学机遇	056
大学行动：检视与思考	074
战略规划：大学对今天和明天的承诺	086
大学治理体系认识与建构	098
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111
大学全面协同教学模式反思与构建	125
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之构建	150
盘点 2011 年高等教育	158
关于师资培养与教师发展调研报告	176
附录	
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秉性、境遇与创造性转化	190
我们这个世界	200

国风书院志	227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228
“升格”的背后 ——山东交通学院组建十周年之际采访蔡先金	250
从自在走向自为 ——评蔡先金教授的新作《大学崛起》	253
后记	256

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源起与沉浮^①

要想懂得现在，你就得了解过去。要想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就得借助历史的坐标。要想准确预测未来，你就得利用历史这面镜子，因为“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卡尔·波普 [Karl Popper]）^②，倘若按照孔子的话说，那就是“告诸往而知来者也”（《论语·学而》）。中国大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近代大学也不是凭空而生。凡物皆有起源，且值得探究，以至于哲学中有个著名命题就是“你从哪里来？”回答这一哲学追问也一直是哲学家的使命。现代大学同样也有起源，只不过由于时间过往，世人对此记忆有些模糊了。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意大利，从大学诞生纪念意义角度出发，公元1088年作为欧洲第一所世俗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时间，从此开始大学的历史编年。西方大学到底起源于何时？至今仍是一个谜。1888年，意大利为了举办规模宏大的大学周年纪念庆典，由著名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领导的一个委员会选定了1088年作为“传统建校年”，并举行了博洛尼亚大学800周年纪念庆典，其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所以大学史界称之为“大学起源神话”^③。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大学诞生时期的关键性事件应该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出现。西方大学的产生是人类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恩格斯在评述中世纪大学时曾经说道：“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得多了。”^④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人类黑暗时代萌生的一朵奇葩，在与教会、王室、世俗的各种顽强的斗争中娇艳地盛开着。大学一旦诞生，就显示出其卓越的特性，成为“唯一在历史过程

① 2013年9月28日，在济南大学第一学术报告厅“齐鲁高教论坛”上的演讲稿。同题收入《大学梦：大学发展之道》（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现有增删。

② [美] 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大繁荣》，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扉页。

③ 参见[瑞士] 瓦尔特·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中始终保持其基本模式和社会功能与作用不变的机构”。然而，世界近代第一所大学“诞生日”本身竟然是一个“神话传说”，这就给世人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了。中国近代大学显然是西方“舶来品”，然而这一“舶来品”到底是何时登岸的，同样留下了许多争议，值得我们去探究。现在倘若要想真正地理解中国大学发展的现状以及设计中国大学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回首中国大学那曲曲折折的来时路，可谓诞生于忧患，成长于战争与动乱，起起落落，历经沉浮；倘若我们要透彻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么就应该回望一下近代以来中国大学过往历程。

一、近代中国大学的萌生

泱泱中华，几度威仪万邦；巍巍华夏，唯独文明赓续。华夏民族为何能如此？这与其自古有之的发达教育体系不无关系。《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而，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辟雍”“泮宫”还是书院，皆非世界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因为现代大学制度无论如何是“舶来品”，即使与本土固有的教育制度相融合与嫁接。自从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而来的就是急剧的“西学东渐”，结果导致中国近现代“大学梦”的追逐与铺开，演绎出数度的梦逐与梦碎的风云残卷，但侥幸的是从没有梦灭，值得我们当下回顾与反思。

近代以前的国人眼里，国朝乃为天下之中，“天朝”之外，本应该是四夷蛮荒，仍未化育，万朝来贺乃为当然之事。是的，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汉中兴，也曾呈现出大唐盛世，至今世界上人们还广泛称呼我们为“汉”，为“唐”。外国人研究中国学称为“汉学”，海外华人聚居区称为“唐人街”。宋代同样强盛，大宋王朝在鼎盛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一半，而且是一个文化极为兴盛的时代。即使到了清朝，还有“康乾盛世”可言，至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五分之三。那时的欧洲精英阶层十分仰慕中国的文化以及社会治理状况，家藏一尊青花瓷显得尊贵，听上一曲《茉莉花》就得到满足，以至于在欧洲刮起了富有“中国趣味”的洛可可之风。在西方的启蒙风潮中，我们看到不乏东方文化的景观。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

中国：“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①狄德罗则认为：“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②“天朝”那是何等的强大！这也确实值得国人自豪与骄傲。然而，清朝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落日的辉煌中必然呈现出末日的衰败。清朝后期，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以至于陷入落后挨打之境。对于东方这个庞大的帝国，马克思说：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的悲歌。”^③

辉煌过去可能更有利于照射未来，腐朽的物质更有可能利于生长出新生物。近代大学梦是随着天朝梦的破碎而产生的。近代封闭的国门打开之后，“西学东渐”之浪取代了“东学西渐”之潮，于是乎国人产生了接受与举办新式大学教育的梦想。此时有一明一暗的两股力量助推近代“大学梦”的萌生。从明的力量来说，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洋务派为梦想成真亦身体力行，兴办新式学堂。从暗的力量来说，西方列强庇护下传教士传播了新式教育的思想，并亦不遗余力地创办教会大学，推行西方教会教育。

（一）传教士教会大学的“鸠居”梦

《诗经·召南·鹊巢》载“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说的是鸠强占鹊的巢用来居住，并在鹊的巢里生养休息。近代夷者来华，西洋人就犹如那鸠，在中土做着各种各样的美梦。时任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英国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的日记可说明这帮人的野心。他在1865年5月30日日记中写道：“我看到我所提议的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此同

①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② 转引自《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时,我必须努力,为这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给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① 作为宗教或者说意识形态搬运工的传教士就做起了“鸠居”般的大学梦,试图直接在中土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构建属于自己的教会大学。

明末清初出现了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1571年,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学——圣保禄公学,然后于1594年升格为大学,并以圣保禄学院(俗称“三巴寺”)为名注册成立。“这不仅是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所西式大学、教会大学,而且是整个远东地区创办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② 进入19世纪,教会学校更是在中国传统教育陷入危机的时候乘虚而起。1839年(道光十九年),伦敦传道会创办的“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成立,由英国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出资办学,马礼逊协会管理。初期学生6人,即黄宽、黄胜、李刚、周文、唐杰、容闳,日后各有建树。这成为基督教会在华教育事业的开端。倘若按照现在的历史分期法,那么以上两所教会大学应该属于中国古代教会大学。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应是山东的登州文会馆。1863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狄考文来到中国,于次年(1864年)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家境贫寒的学生。当时,因为担心学生的家长迫于社会的压力,提前让学生退学,所以学堂要与他们签约。1876年该学堂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具备了中学水平。1882年,美国纽约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文会馆为大学。至此,中国大地上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出现了,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的众多‘第一’可谓数不胜数——第一套全面、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第一批通行全国的新式教科书,第一个使用阿拉伯数字等西方现代数学符号,第一个引进X射线理论知识,第一个使用发动机、亮起电灯、制造电子钟,第一个使用白话文教学和写作,第一个引进西方现代音乐声学理论,第一首学堂乐歌,第一个发展学生自治组织……”^③ 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移至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中的大学班合并,更名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和青州的神学院迁济南,正式组成济南齐鲁大学,下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说起山东齐鲁大地,确实是教育风水宝地,可谓开教育风气之先。春秋时期,孔子开设杏坛,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从此由学在官府进入私学时代。战国时期,齐国设有稷下学宫,与西方

① [美]布鲁纳、费正清等:《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1863—1866)》,陈绛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342页。

② 吴骁:《谁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光明日报》,2015-11-8,第13版。

③ 吴骁:《谁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光明日报》,2015-11-8,第13版。

的柏拉图学园，形成了世界“轴心期”的“双子星座”。山东教育史可谓是中国教育史的缩影。

到1889年，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在华举办的学校总数约2000所，学生数约4万人。1877年5月，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为当时各教会学校统一编纂教科书。^①到1917年，英国在华设立高等学校19所，美国设立14所，英美合办9所，在校生共计9492人。教会学校虽然是一种文化侵略，但是“西方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给处于危机中的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向近代教育转变的某种示范与启迪”^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来，西方教会学校在华“完成了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华为建立近代意义的大学提供了示范性的借鉴。^③张百熙在《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中坦言，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④

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大地上教会大学已蔚为大观，如新教创办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等13所，天主教创办了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辅仁大学等3所。教会大学具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允许其自由开设，“亦毋庸立案”，更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制约，颁发文凭来自国外，便于学生留学。1952年，大陆院系大调整中，教会大学便从我们的视野中集体消失了。从此，教会大学全部退出了大陆的舞台。这可能也实践了毛泽东所说的“打扫干净屋子”的说法吧。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大学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本土，与几千

① 李兴华：《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

② 李兴华：《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③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同志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④ 谭伯牛：《假维新中的真改革》，新京报编《科举百年》，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年来沿袭的官学、书院、科举等传统教育模式形成了对比。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学校自然也有着先天的优势，它们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1846年，美国传教士布朗（Rev S. R. Broun）带领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从上海出发，赴美留学。这虽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之发端，但非官方所为。后来，容闳又带领120位幼童赴美留学，在中国近代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治七年（1868），容闳曾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条陈，其中有一条便是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此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接受容闳的建议，并一再上奏清政府，申述选派幼童出洋学习的重要性。同治十年（1871）七月，又奏上出洋游学章程并获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八日，第一批幼童詹天佑、梁敦彦、黄开甲等三十人，由陈兰彬、容闳率领，从上海启程，赴美留学。至光绪元年（1875）九月，前后派出四批，共120名。随后，出国留学形成潮流。据统计，在1890年至1910年的20年间，赴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492人；而1906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7283人。

近代教会大学史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然而，我们也不可否认教会大学的宗教性质与文化殖民的目的。而今评价教会大学应该是功是功，过是过，真正做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既不可一味美化，也不可一概抹黑。无论如何，教会大学的梦主要是传教士以及西洋人的“鸠居”梦。

（二）洋务学堂：铺路“大学梦”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开始。洋务派举办“新政”，标榜“求强”“求富”，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制度办法，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此，洋务派遵循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以学习“西文”和“西艺”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官办新式学堂，即官办高等专科学校。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在传播西学和提倡新教育的活动中创办了洋务学堂，这些新学堂“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对清末的学制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有所促进的”^①。1862年成立的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最早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最初，该校只是一所外语学校，1867年，京师同文馆在增设了天文算学馆之后，才算初具近代新式教育性质。

^①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历二十五年之久，可知同文馆与西学之关系。从1871年到1897年，京师同文馆又先后增设了德文馆、医学馆、格致馆、东文馆。1876年，建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1888年，又建立了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随着学科设置与仪器设备的日益丰富，京师同文馆的现代高等教育特征也愈加显著。

1861年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了上海机器学堂。1866年福建马尾造船厂附设了福建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个学堂，前堂注重法国学问，又称“法国学堂”，后堂专重英国学问，又称“英国学堂”，而教习当然需要延聘洋教员了。这些新式学堂既是洋务派信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结果，又是本土初始仿效西学的产物。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奏请清政府创办自强学堂，这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1893年11月29日，张氏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折》，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如1880年建立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建立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建立的广州陆师学堂、1890年建立的南京水师学堂。据统计，从1862年设京师同文馆到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洋务派共创办近代学堂22所。这些官办的新式学堂只不过是一种高水平的训练学校而已。

东西学之间虽然有论争，但“更多的人认识到学术本为一体，不分中西”^①，如王国维在1911年所云：“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②由此看来，中国新式教育机构主要渊源于两种方式：一是本土人士借鉴与引进西方办学理念与制度来举办本土的教育；二是西方人士直接在本土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举办的教会大学。

无论是新式学堂，还是教会学校，甚或是出洋留学，仅是点燃了国人的大学梦想，铺垫了“大学梦”而已，然而大学逐梦过程却从此铺开了。“自从明代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中对英文University一词翻译的借用，它逐渐演化为欧洲大学的概念，再经过清末借鉴日本的学制，直接搬用日文词汇‘大学堂’，最终确立了其后殖民地时代的舶来品地位。所以，大学一词虽然在现代被广泛套用，其本质含义却早已经蜕变为西方式的，丧失了其本土的文化

①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②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